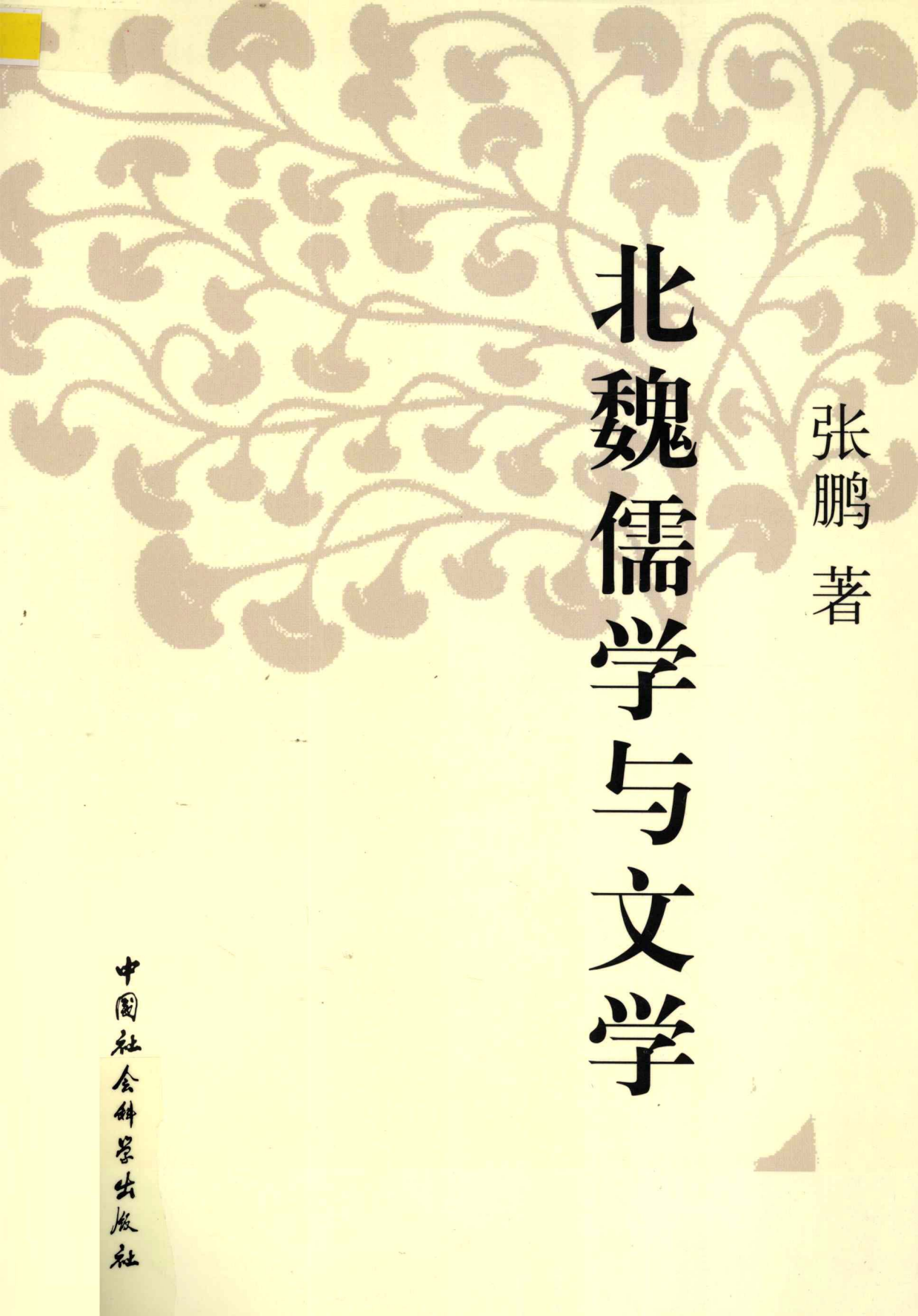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repeating pattern of stylized, light brown floral motifs on a cream-colored background. The motifs consist of scrolling vines with small, rounded leaves and flower-like shapes.

张鹏 著

北魏儒学与文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魏儒学与文学

张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魏儒学与文学 / 张鹏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 - 7 - 5161 - 1375 - 2

I. ①北… II. ①张… III. ①儒学—研究—中国—北魏②中国
文学—古典文学研究—北魏 IV. ①B222. 05②I206.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566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周晓慧
责任校对 林福国
责任印制 李 建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5.5
插 页 2
字 数 265 千字
定 价 47.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有为者如掘井

青年学者张鹏的《北魏儒学与文学》即将出版，这部严肃的学术著作使我想起了亚圣孟子的名言：“有为者如掘井”（《孟子·尽心上》）。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出于对其人其作的深入了解。从2001年至今，十多年来，他在我的指导下，先后出色地完成了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学业，并在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骨干作用。白居易诗云：“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放言》其三）在长期接触中，他给我的深刻印象有三点，即有卓犖高蹈的事业心；有执着顽强、甘坐“冷板凳”、埋头苦干的敬业精神；有严肃认真的创新思维。基于这三点，我称他是“有为者”。本书的写作，利用了大量文献资料，阅读了先哲时贤的论述，焚膏继晷，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层层掘进，探幽洞微，时有创获。因此，我又称这本书是“掘井”所得。

这本书的雏形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当时就以优秀论文博得了古典文学著名专家董乃斌、罗国威、张学忠、魏耕原等先生的褒评，近几年来，又作了一些修改和完善。从最后定稿来看，全书有三个特点比较突出。第一，选题意义重大，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北朝历史、文化研究非常重视，相比之下，对北朝文学，尤其是北魏文学的研究要冷清得多。北朝由于少数民族统治，以及长期的战乱、动荡，文献本身留存已少，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就更少。又因为南、北朝文学发展的不平衡，加之，北朝文学作为南朝文学附庸的观点根深蒂固，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北朝后期，关注焦点多在于南、北朝文学的融合上。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北朝文学，尤其是北魏文学研究的继续深入。北朝文学作为汉、唐文学的过渡，在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意义。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



权，与此前十六国诸政权的区别在于：通过对以儒学为主的汉族文化的吸收，形成了新的不同于两晋南朝的儒学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其文学发展也出现了有异南朝的过程。同时，由于对儒学文化的认可，北魏政权为政治分立状态下南、北文学的交流、融合提供了支持。这样，对北魏儒学与文学关系的论述，就成为描述北魏文学存在、发展的关键所在。《北魏儒学与文学》一书，正是从这一关键点出发，对北魏文学作了细致地梳理。视阈广阔，新见迭出。

第二，论述细致、严谨。北魏文学虽然缺少一流作家和一流作品，但文学现象的复杂性却远远高于同时代的南朝文学。这对于研究者而言，需要更为缜密的逻辑思维，也就具有更大的挑战。在本书中，作者没有把儒学当成铁板一块，而是将其分为学术思想、政治制度、礼仪风俗和士人活动四个层面，研究不同时期儒学的不同层面与文学的关系，关注汉族士人在北魏汉化中的作用及影响。在描述北魏儒学的开端时，作者十分注意地域文化的传承，先考察鲜卑族进入中原之前，十六国时期北方儒学的存在方式，以此作为北魏儒学发生的前提。在论述北魏儒学与文学的关系时，又特别注意士人的来源，如河北文人、河西文人、平齐民、鲜卑皇族、由南入北的汉人等，结合其所传承的区域文化、文学传统，来考察北魏文学的流变。这些细节的论述，为描述北魏文学的总体构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避免了空疏、主观的判断。

第三，文献翔实。文学研究要有强烈的时空意识。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现象的命名，都与地域或时代相关，如“元嘉诗风”、“永明体”和“邺下文人集团”、“竟陵八友”等。应该说，没有对一个时代重要事件以及与作家、作品相关的时间、地域的准确认知，学术研究就难以深入。在这一点上，作者作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本书正文之后所附的“北魏作家名录”，按时间先后收录了189位北魏作家的基本信息，包括每位作家的郡望、卒年、重要作品、主要事迹等，资料丰富，考证确凿。正文部分的论述，紧密结合这些文献考证，是这份名录文献价值的综合发挥。凡划分北魏文学发展阶段、论述北魏文化与文学的源流、引证作家作品，都以之为依据。在此基础上征引文献，对比不同时期的作品，研判文学现象的继承和突破，分析诸多新变与儒学发展的关联，常常能出入文史，证据确凿。

总之，本书独辟蹊径，观点新颖，内容充实，涉猎广博，功力深厚，其学术价值自当为学界所认可。当然，本书还存在一些不足：文献选取



上，对传世文献运用较多，涉及面也很广，但对大量出土文献采用不够。尽管在“余论”部分对北魏石刻文献作了一些宏观分析，但总嫌简略。

学术研究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作者在从事北朝文献整理的过程中，专心致志，勤于思考，学养才识日趋成熟。相信随着文献的不断完备，以及作者学术修养的不断提高，其对古代文学的研究也会更上一层楼。最后，让我借用李清照的词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渔家傲》），祝愿他在学术研究上知难而上，奋飞猛进，做出更大贡献。

韩理洲

2012年9月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

序

有为者如掘井



前言

北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对隋唐两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北魏文学作为汉唐之间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有其独特的文学史价值。对北魏文学具体状况以及影响其发展的诸多因素的研究，对研究汉唐之间文学的嬗变，也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北魏文学的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较为薄弱的环节。就目前来看，对北魏文学的进一步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继续深入：

首先，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其政治、文化的主要特点在于汉化，而汉化过程起于对儒学的接受。描述儒学在北魏政治、文化中的存在和发展，研究其在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北魏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时期文学的存在和发展有着决定性影响。儒学作为北魏政治、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探讨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深入研究北魏文学的一个重要方面。

其次，北魏文学作为汉唐之间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方面保留了汉代文学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特点，另一方面又在发展中吸收了两晋南朝在文学观念、文学技巧等方面的新变，初步实现了南北朝时期南北文学的融合。对于这一时期文学的存在及其发展变化中的具体环节的详细描述，是深入研究北魏文学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文学作为表达思想和感情的工具，在鲜卑贵族对儒学广泛深入的接受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功用。一方面，鲜卑贵族对文学的重视促进了儒学为主体的汉族文化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另一方面，承载了儒学思想观念的文学创作也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民族心理素质，使得拓跋鲜卑的汉化程度超过了此前十六国时期北方各个少数民族。对这一过程的描述也是北魏文学、文化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从北魏文学研究的发展来看,20世纪80年代开始,北魏文学逐渐得到重视,大量成果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些与北魏文学、文化有关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 文学史的研究

曹道衡、沈玉成在《南北朝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的北朝文学部分较早对北魏至北周文学作了具体细致地描述,揭示了北朝文学的发展过程;对于北魏文学,也将其分为前后两期加以论述,形成了北魏文学史的基本框架。李开元、管芙蓉的《北魏文学简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是以北魏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第一部断代文学史,对北魏作家作品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将一些应用性散文纳入对北魏文学作品的考察中。其后,周建江的《北朝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北魏文学在以孝文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的基础上,将北魏皇室文学单列为一部分进行论述,注意到了鲜卑皇族对汉人文学的接受。但这些著作对北魏文学的研究基本局限在少数作家的作品上,对于北魏文学的总体存在状况较少全面细致地描述,对于文学发展中一些具体环节的探讨也不够深入。

此后,曹道衡、刘跃进在《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拓展了南北朝文学研究的视野,收入的作家作品极为丰富,其凡例称:“见于正史《文学传》或《文苑传》者均收录;见于《文心雕龙》、《诗品》论及者皆收;史书记载其有才能而留存作品极少者酌收;史书未载而今留存重要作品者酌收;《隋书·经籍志》、《高僧传》、《续高僧传》及《云笈七签》中有著作著录或有创作表现者酌收。”^①这样的收录标准,对于文学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文献价值。但是该书对一些作品的系年没有作出详细论证,有的地方还存在一些错误。收录标准在收集北魏作家作品时未能严格贯彻,造成一些疏漏。

(二) 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学与文化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研究的新趋向,这方面的成果有:吴先宁的《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通过北朝士族这一中介环节,对士族间的冲突所导致的北朝文化特质加以分析,从北朝文学精神的层面,分析了北朝文学不发达的原因,其中也涉

^① 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及北魏文学的一些内容。1999年9月,曹道衡《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出版。本书从历史传统、学术变迁、文化传统、生活情况等方面入手,将北朝文学纳入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加以论述,可以说是20世纪北朝文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但它对于北魏文学的描述也相对简略。

(三) 文学文献的搜集整理

刘跃进的《中古文学文献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和穆克宏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中华书局1997年版)从文献学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文学研究所涉及的基本文献作了评介,其中也论及北魏部分的一些重要文献。对于原始文献的辑录整理,则有韩理洲主编的《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10年版)。本书针对清代严可均所辑的《全后魏文》,收录了严氏全文未收的北魏及东西魏文章1500多篇,包括严氏漏辑的古籍中所存文献以及碑刻、墓志、造像记、买地券、吐鲁番文书等大量内容,为系统深入研究北魏文学、文化全貌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四) 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研究

除了文学研究以外,学术界对于儒学的研究,也为北魏文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果。陈明的《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士族:特殊形态的知识分子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对于儒学历史文化功能在理论上进行了探讨,并对东晋和北朝士族在儒学与政治关系中所起的作用进行了深入论述,其中对北朝士族也有专章论述。姜广辉主编的《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对汉代以后儒学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作了重点分析,论述了儒家经学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统治思想和主流文化的演变过程。刘惠琴的《北朝儒学及其历史作用》(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对于北朝儒学的存在和发展,以及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作了详细论述,指出北朝儒学在汉、唐之间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

综上所述,学术界对于北魏文学、文化的研究,有以下特点:

1. 在研究对象上,大多以整个北朝或魏晋南北朝为研究对象,其研究重点都放在魏晋南朝或北齐北周时期,对北魏文学、文化重视不够。在一些著作中虽然有专门的章节来论述北魏文学与文化,但多以其为过渡时期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

2. 对北魏文学的描述上不够细致客观,对于作家作品的选择不够全面,难以反映北魏文学存在的实际状态。在一些著作中更出现了为论述某



些特征而对这一时期的一些文学现象过分强调或注意不足的情况。

3. 在文学与文化关系的论述中，对北魏儒学的考察重点主要放在经学即思想学术方面。对这一时期儒学与文学的关系缺少全面系统的探讨。

从上述特点出发，在研究范围上，本书所指的“北魏”，指从道武帝登国元年（386）到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550）这一历史时期，包括北魏、东魏两个政权。这一限定，一方面与《魏书》相一致，另一方面也和文化、文学的发展过程有关。东魏文化、文学继承了北魏传统，西魏则具有一些不同的特征，在本书中不做重点论述。在研究内容上，本书以儒学与文学的关系为题，全面系统地描述北魏儒学和文学的存在，分析儒学的不同层面对文学的影响，以及不同时期儒学各个层面的变化对文学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力图揭示北魏儒学与文学在这一时期的互动关系。

从前面提出的三个方面的问题出发，本书首先对北魏儒学和文学的存在状态作出了系统的描述。在对文学的考察中，指出北魏文学最主要的思想内容来自于儒学，包括其政治观、历史观、人生观各个方面。文学作品中意义的明晰和规范与北魏社会文化的发展，即政治文化的儒学化关系密切。因此，儒学的存在和影响是本书的中心研究课题。

在第一章，通过对两汉魏晋儒学存在状况的考察，指出通过两汉的发展和实践，儒学的观念、原则已深入思想学术、社会政治、礼仪风俗和士人活动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构成了西晋十六国时期北方儒学的整体内容。儒学的体、用已经合而为一，其中最积极、最具能动性的是士人对儒学原则的身体力行。在对儒学的上述考察中可以看到，在北魏时期，儒学被接受和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儒学的四个层面是以如下顺序依次产生效用的：从十六国进入北魏以后，通过汉族士人的活动，儒学首先在政治领域得以存在并发挥效用，进而在对历史的叙述中发挥其在思想学术上的影响，从而导致全社会由上而下的礼仪风俗的变化。这些变化又重新在行为上影响了下一代士人，从而使得北魏的汉化能够深刻而持久。

本章还从宏观上描述了北魏文学的存在。要对北魏文学的存在状况作出一个比较客观全面地描述，仅靠目前各版本文学史所涉及的作品是远远不够的。但如果以严可均《全后魏文》和韩理洲的《全北魏东魏西魏文补遗》所收全部北魏文章作为考察内容，则显得过于繁芜。在这个问题上，本书借鉴了曹道衡、刘跃进的《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的做法，结合北魏文学的实际状况，对其凡例的规定作了适当扩展，更为全面、客观地描述了

北魏作家的分布以及作品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对照《魏书·儒林传》所描述的儒学的分布，指出北魏作家的分布区域与儒学较为发达的地域基本重合。作为作家主要知识构成的儒学规定了北魏文学的思想内容、审美特征和文学风格，北魏文学正是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存在和发展的。

第二章从儒学的士人活动层面和政治制度层面出发，描述了北魏太和以前文学的存在，并指出，北魏统治者对儒学重治术轻文化的接受方式，使得北魏文学在这一时期总体上处于低迷状态。这一章主要从汉族作家的活动方面对其加以描述，以探讨儒学在从政治领域向思想学术领域深入的过程中，如何使文学获得其存在空间并得以正常、缓慢地发展的。这个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出现了一些反复。北魏初期以河北士人为主的作家群体奠定了北魏文学重实用的文学传统。崔浩之狱是北魏政权对儒学的态度和儒学的文化功能冲突的集中体现，民族矛盾和儒学中政治集权的因素限制了文学的发展，整体创作水平较之十六国时期发生了倒退。在孝文帝以前，儒学的存在主要在于政治领域，其原因是北魏政权对于政治稳定的需要。这一时期的文学在儒学“美盛德之形容”的文学观念下得到了存在的空间，与之相应的典正古雅的风格和源于儒学经典的语言系统，以及以四言为主的节奏成为文学的主要特征。在与凉州文学传统的比较中，崔浩、高允的创作成为这一特征的代表。

第三章从政治制度和思想学术层面的儒学入手，对太和以后北魏文学的存在和发展作了描述，认为随着政治上对儒学的接受，北魏儒学文化逐渐形成，儒学的思想观念开始产生影响，由此而形成新的政治结构下的文风的变化。儒学政治使得作家对政权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前一时期的试探和拘谨已有所改变。儒学文学观中“言志”和“怨刺”的功用论所产生的影响，改变了此前以赞颂为主的创作目的。这种变化首先出现在应用性散文中，“太和文风”的出现即是一个明证：抒情成分的加强，典正古雅的风格逐渐被改变，自由活跃的文风开始形成。

孝昌以后，北魏政治的变化使得儒学开始作为调节政治的工具被士人所使用。于是，“怨刺”文学观念影响到文学的发展，由此进一步促进了抒情功能的被重视，引起了太和以后北魏诗、赋的新变：五言诗的写作打破了此前以四言诗为代表的典正古雅的诗风限制，使作家的情志能够得到更为自由强烈的表现。赋的题材从太和以前以国家政治为主转变为以个人境遇为描述对象，骚体的广泛运用增强了作者情志的抒发。多数作家虽然



没有形成自己独特鲜明的个人风格，但从作品的比较中可以看到在文学技巧上对南朝作品的借鉴和学习，袁翻的《思归赋》即是这一特点的集中体现。东魏文学沿着北魏后期的发展方向继续演变，产生了温子昇这样的大家：温子昇在东魏文坛的独特存在状况反映了文学在这一时期相对于政治的独立，而具有才华的作家的创作形成了南北文风的初步融合。

最后一章从儒学在政治制度、思想学术、礼仪风俗、士人活动各个层面的存在和影响出发，分析了北魏皇族文学，由此指出，对汉族文学的接受和创作实践，导致了北魏皇族民族心理素质的汉化。文学作为儒学文化的载体，实现了以夏变夷的深层次功用，文化代替血统成为民族区别的标志，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对北魏皇族文学存在的研究，力图揭示如下规律：儒学的影响在北魏孝文帝以前，对鲜卑上层来说只是一种治术，但从崔浩等人修史和汉族士人广泛参与政治开始，历史表述的儒学化和制度礼仪的儒学化开始影响到后代鲜卑人的心理状态。孝文帝本人就是这一影响最为突出的体现，而他对于儒学中“诗言志”抒情功能的认识和运用，使得鲜卑人在情感表达方式上也开始儒学化，最终汉语成为官方语言的政策又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另外，太和以后，与南方角逐的重心从军事转移到文化上来，对南方文化和文学的热衷正是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要求，于是，从政治目的出发的儒学文艺观得到进一步的认同和实践，除美刺以外，言志抒情的内容也大量出现。这一风气在北魏皇族中继续深入发展的结果，使得一些皇室贵族在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情感表达上都体现出儒学的深刻影响。北魏末年的政治动荡使得皇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从孝庄帝和节闵帝的诗歌中可以看到其文化心理上的儒学化特征，已经很少能找到鲜卑族作为非汉民族的特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制度的儒学化引起社会思想的儒学化，进而通过儒学观念下文学的影响，导致鲜卑皇族民族心理素质的变化。北魏鲜卑政权从外到内完成了其儒学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文学起到了极其深广的作用，而鲜卑民族也由此完全融入了汉文化的历史长河中。

在对儒学与文学关系的探讨中，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理论研究与文学现象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本书通过对儒学的四层分析法，结合对儒学和文学基本资料的梳理，找到其内在的关联，由此将儒学与文学联系起来，揭示北魏文学的发展状况及其成因。



2. 文本分析和比较的方法。通过文本的阅读分析，考察其语言节奏、意象、意义三者的关系，并通过具有可比性的作品、作家之间的比较，分析其差异及形成这些差异的原因，结合作家创作与儒学之间的关系，描述儒学在文学各层面上的影响。

3. 文学与文化的综合考察。在前面两种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作家所处地域的文化特征，对于文学活动与作家文化修养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关系进行探讨，以分析某一时段文学特点的文化渊源及具体成因。

4. 综合文学文化因素考察民族融合的方法。在南北朝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析出其可能互相影响的一些因素，对北魏文学中不同民族文化的特征加以分析描述，并从儒学的文艺观和文学的实际效用出发，论述文学在民族心理形成和变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北魏文学的儒学背景	(1)
第一节 汉晋之间儒学的构成	(1)
第二节 以士人活动为主要存在的十六国儒学	(14)
第三节 北魏儒学的存在和发展	(28)
第四节 北魏儒学与文学的存在和发展	(41)
第二章 政治制度层面的儒学与汉人文学的存在空间	(58)
第一节 十六国儒学与北魏文学传统的形成	(58)
第二节 儒学理想的挫折与北魏文学的停滞	(71)
第三节 儒学政治的形成与北魏文学的复苏	(84)
第三章 儒学文化与文学的繁荣	(102)
第一节 儒学政治的发展与太和文风	(102)
第二节 儒学的文化价值与北魏诗赋的新变	(117)
第三节 常景和温子昇	(130)
第四章 儒学背景下的文学与北魏皇族的汉化	(144)
第一节 北魏皇族对汉族文学态度的变化	(144)
第二节 北魏皇族文学创作与其民族心理的儒学化	(155)



余论..... (167)



附录 北魏作家名录..... (170)

主要参考书目..... (226)



后记..... (231)





第一章 北魏文学的儒学背景

第一节 汉晋之间儒学的构成

儒学从西汉中期取得独尊地位以后，逐渐由一种思想学术转变为国家意识形态。经过董仲舒等人的努力，西汉今文经学成为一个以《春秋》学为中心，涉及哲学、政治、文化、习俗等多个社会层面的思想体系，同时借由国家政权的力量进行着对汉代社会诸多方面的改造和规定。从西汉到西晋，儒学通过对上述各社会层面的规定和影响，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灵魂，儒学传统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传统被不断地继承和发展。这一过程，不单纯是一种思想学说的推广和实践，更应看做儒学本身存在方式的演进。

从孔子时代起，儒学就是一种力图通过社会实践规范社会政治、文化的学说，其实践性远胜其思辨性。汉晋之间，儒学的实践性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发展：一方面，由国家政权力量发起的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规范使儒学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模式以前所未有的深广程度影响着社会的变化；另一方面，与儒学诸内容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生活又为儒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稳定而广阔的实践平台。两汉魏晋，儒学与其试图改造的政治、文化已合而为一，形成稳固的上层建筑。在这个“自激”的过程中，儒学的存在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描述：

儒学的思想学术层面：在哲学思想层面，董仲舒提出的天人哲学，为西汉中期加强王权，建立统一的大国政治从理论上给予了论证。“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他最明确地把儒家的基本理论与战国以来风行不衰的阴阳家的五行宇宙论，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常政治纲领有了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使《易传》、《中庸》以来儒家所向往的‘人与天地参’的世界观得到了具体的落实，完成了自《吕氏春秋·十



二纪》起始的、以儒为主、融合各家以建构体系的时代要求。”^①此后，东汉时期由班固整理的《白虎通义》，又在董氏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吸收了阴阳数术的一些因素，将天人哲学的体系进一步完善并推行到社会各个层面：“这是一种成体系的思想学说笼罩一切的尝试，也是把思想家个人性思考转化成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当人们习惯并接受这一套由数字化的语词系统所表示的思想学说时，人们其实已经不由自主地放弃了追问其合理性来源的权力，也已经承认这种‘标准化’的强制性力量对个人心灵的规范，于是，思想一致的时代就不期而至。”^②

这种统一思想以适应统一国家王权集中需要的过程使得儒学在西汉中后期到东汉得到迅速地发展，但其以阴阳学说的大量引入为基础的天命论也为自身的发展埋下了隐患。汉末大乱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自由思考的发生，虽然这一时期的思想框架并未完全超出儒学的范围，但古文经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基础的天命观念。而党人又以儒学为武器，直接针对现实政治展开了攻击。随着东汉政权的覆灭，与大一统的政治紧密结合的儒学也进入了一个低谷。作为正统思想的儒学随着支持它的、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崩溃而衰落，这使得魏晋时期士人对于现实政治的哲学思考重新活跃。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兴起，似乎是对儒学的一种毁灭性打击，然而从玄学所关心的“名教”与“自然”这一问题来看，玄学家所做的努力却是对儒学所提倡的社会政治秩序，即“名教”的一种不同于天命神学的另外解释。在这一层意义上，玄学并非对儒学的全面否定，而是在董仲舒的学说中，以“自然”或“才”、“性”代替“天”作为“名教”的合理性解释，其对于现实制度的论述仍然是以儒家的社会伦理结构为框架的。在孔子看来，作为“礼”的社会规范是以人的“仁”的道德作为精神内核的，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③！即是说人“亲亲”的情感是社会规范的基础。在郭象的《庄子注》中，其对于人的天性与社会等级之间的关系，有着如下的认识：

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

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6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6页。

③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页。